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

朝戈金 主编

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 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

[德] 卡尔·赖希尔 (Karl Reichl) 著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

朝戈金 主编

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 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

Turkic Oral Epic Poetry:
Traditions, Forms, Poetic Structure

[德] 卡尔·赖希爾 (Karl Reichl) 著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德]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著、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161-0122-3

I. ①突… II. ①卡…②阿… III. ①突厥语族—史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4738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享有中国大陆地区简体中文版专有权,该权利受法律保护。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1-7742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mslxx123@sina.com)

特约编辑 毛巧晖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96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自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W. J. Thoms）于 19 世纪中叶首创“民俗”（folk-lore）一词以来，国际民俗学形成了逾 160 年的学术传统。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90 多年来的发展几起几落，其中数度元气大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一学科方得以逐步恢复。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学理依据正是民俗和民俗学）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倡导，民俗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在民族文化振兴中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顾颉刚、容肇祖等人长期工作的机构，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大都处于学术黄金年龄，成果迭出，质量颇高，只是受既有学科分工和各研究所学术方向的制约，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形成规模效应。为了部分改变这种局面，经跨所民俗学者多次充分讨论，大家都迫切希望以“中国民俗学前沿研究”为主题，申请“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集中展示以我院学者为主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晚近学术成果。

这样一组著作，计划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从内容方面说，这套书意在优先支持我院民俗学者就民俗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成果，也特别鼓励田野研究报告、译著、论文集及珍贵资料辑刊等。经过大致摸底，我们计划近期先推出下面几类著作：优秀的专著和田野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代表性的民俗学译著；以及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择选优秀的论文结集出版，拟定名为《中国民俗学》（*Journal of China Folkloristics*）。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整合这样一套书呢?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觉得,民俗学研究力量一直相对分散,未能充分形成集约效应,未能与平行学科保持有效而良好的互动,学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被本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所关注、进而引用和借鉴。其次,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全国社会科学刊物几乎都没有固定开设民俗学专栏或专题。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繁荣的情形相比较,学科刊物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限定了民俗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的发挥,严重阻碍了民俗学科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再者,如何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进而实现学术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也是目前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项目的组织运作,将欧美百年来民俗学研究学术史、经典著述、理论和方法乃至教学理念和典型教案引入我国,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近些年来,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也频频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适时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检验,并随时就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应用方面的诸多弊端,给出批评和建议。

从工作思路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着眼于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整合、介绍、分析、评议和田野检验,集中推精品、推优品,有效地集合学术梯队,突破研究所和学科片的樊篱,强化学科发展的主导意识。

我们期待着为期三年的第一期目标实现后,再行设计第二期规划,以利我院的民俗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影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确保我院的民俗学传统在代际学者之间不断传承和光大。本套书系的撰稿人,将主要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民俗学者们。

在此,我代表该书系的编辑委员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院科研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

朝戈金

中文版前言

本书的读者不难发现，我对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认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得以大大加深。1985 年，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北京的交通主要靠自行车，而且西方游客很难获得批准去喀什的巴扎游览。那一年，我有幸第一次遇见了柯尔克孜族著名史诗歌手居素普·玛玛依，并且在帕米尔高原脚下的盖孜村采录了《玛纳斯》史诗的片段。那一次，我的主要目的是搜集中国突厥语民族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被翻译成德文于 1986 年出版。稍后的 1989 年，我又有机会在新疆伊宁市、赛里木湖岸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首府阿图什采访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史诗歌手。我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德文化交流计划内为我精心安排了那两次旅行。我尤其要感谢上述两次旅行中为我担任翻译的赵丽娟女士（1985）和朝戈金先生（1989）。他们不仅承担了翻译工作，而且帮助我圆满地安排了在新疆的整个调研活动。此外，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分院的诸位学者和领导。

我的这本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荣幸。在中国访问期间以及之后，本书英文版于 1992 年出版之后，我又遇见了很多学者、民间艺人、学生以及其他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有机会探索和研究中国独有的多文化、多语言世界中的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领域。我非常高兴我的这本著作能够有中译文，并深深地感谢本书的中文翻译者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先生，以及跟我有 20 多年友情的丛书主编朝戈金先生。

我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在汉语世界里找到热心的读者。突厥语民族口

头史诗遍布从西伯利亚到中亚的广阔地域，还包括中国新疆、土耳其以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它们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还需要传承和保护。如果这本书能够对更好地了解这一文化遗产有所帮助，也就达到了目的。我最后还要感谢所有对我的研究给予过帮助的人，尤其是史诗歌手们。在这里不可能列出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因此请原谅我用这种全球通用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卡尔·赖希尔

2010年5月，于波恩

英文版主编序言

编辑出版这套“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口头传统研究丛书”(Albert Bates Lord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的目的,就像其刊物伙伴《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样,是为了整合相关学科中那些集中关涉某一或若干口头或源于口头的传统的论文、专著以及论文集,以期它能够对已经覆盖了一百多种语言传统的这一研究领域内的众多学者进一步深入观察和研究提供帮助。丛书第一辑6本书已经编就,它们分别是:雅各布·纽斯纳(Jacob Neusner)的《口头性与希伯来》(Orality and Hebrew Mishnah)、斯特芬·格罗斯克(Stephen Glosecki)的《贝奥武甫和萨满教》(Beowulf and shamanism)、露丝·韦伯(Ruth Webber)主编的《西班牙民歌》(The Hispanic ballad)、朱迪斯·西格(Judith Seeger)的《“康迪·克拉利司”的民歌传统》(The Ballad tradition of “Count Claros”)、姆里·麦吉利夫雷(Murray McGillivray)的《记忆和中部英语传奇歌》(Memorization and the Middle English Romances)、马塞尔·茹斯(Marcel Jousse)的《口头体裁》(The Oral Style)由埃德华·塞纳特(Edgard Sienaert)及理查德·惠特克(Richard Whitaker)翻译。这一辑还将包括有关《贝奥武甫》以及熊之子民间故事的研究,来自托果(Togo)的非洲骗子故事,荷马史诗中的认同表达,以及阿兰·雷诺尔(Alain Renoir)的相关论文集等书目。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进一步增强和维持学者之间的对话机制,因为我们各自都根据当今学术范畴的界限而被分割开来,很少有机会彼此沟通和交流。按照这种思路,我们热情地邀请较大范围内的新的声音能够加入进来,正像本卷以及其他卷本的读者那样,特别希望有人能够以作者身份参与到这一不断推进的研究中来。

以洛德的名字命名的这部丛书之第7卷,即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的《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Turkic Oral Epic Poetry*),通过对中亚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高水平的专业性介绍,回答了我们长期以来所期待的问题。事实上,正是这些传统,尤其是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的传统最初引起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兴趣,促使他将自己基于荷马史诗文本基础上的口头传统创作理论探讨扩展至田野调查方面,并用它来论证那些真正的史诗歌手是如何以口头形式创作史诗的问题。由于客观政治原因阻碍了帕里和洛德沿着威廉·拉德洛夫(Wilhelm Radloff)^①的足迹探求中亚史诗的梦想,他们便只好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了前南斯拉夫,去那里探索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盲地区的史诗传统。调查计划的这一转变对于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而言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正是从那以后,是南斯拉夫,而不是中亚史诗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新理论依赖产生的范例,而且这个新理论在之后的50—60年中对那么多不同语言区域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而在此期间,正像赖希尔所指出的那样,拉德洛夫曾经探讨过,甚至帕里曾计划要投身于其研究的突厥语民族传统却没有引起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关注。

本著作可以弥补目前因缺乏突厥语民族传统研究专家而造成相关信息匮乏的缺憾,与此同时,它还能够给各领域的学者提供比较研究的素材。赖希尔教授在这一领域不仅卓有成绩,而且无人可比:他最初由于对古代英语的兴趣而在中世纪研究方面得到系统的训练,还曾在苏联和中国的突厥语地区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并且还是拉德洛夫所创立的波恩中亚研究班的成员。他主要关注这个领域的“中心传统”,尤其是乌兹别克、哈萨克、卡拉卡尔帕克和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传统,当然,也同时涉猎了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阿尔泰、图瓦、雅库特和巴什基尔的史诗传

① 帕里深受启发的是拉德洛夫在其编著的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10卷本丛书第五卷中的导言 *Proben der Volksliteratur der Nördlichen Türkischen Stämme, vol. 5: 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är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85)。这篇导言的英译文见《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第五卷(1990),第73—90页。(汉译文参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附录,第241—262页。)有关拉德洛夫对帕里的影响参见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口头创作理论:历史及其方法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3页。——译者

统。赖希尔的著作基本上是描述性的。他首先通过追溯历史和语言背景，梳理了史诗传统最初的文献记载，展示了歌手及史诗表演的生动图像，考察和研究了文类、故事范型和程式句法，并且探究了歌手“表演中的创作”、记忆、修辞和传播等问题。他的研究，对于各领域的学者而言，犹如在世界上最重要而又最令人困惑的一些口头史诗传统中做一次完整而卓有成效的旅行。

我想用一个注释结束这个前言。1986年，当我向现已故去的阿尔伯特·洛德谈起即将启动，以他名义命名的系列丛书，并请教他对于这一系列丛书的设想以及入选书目等问题时，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卡尔·赖希尔关于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著作。现在，事隔6年之后，他的这一建议终于修成正果，并作为丛书第7卷入列其中。对此，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约翰·迈尔斯·弗里

（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哥伦比亚）

初版前言

一部关于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著作无须进行过多的解释和说明，但它出自一位中世纪学家之手可能就需要做一个交代。我早年在慕尼黑上学时曾买到一本题有：*Der Sänger erzählt: Wie ein Epos entsteht* 的书。它便是刚刚被翻译成德文出版的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 B. Lord）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它使我着迷，并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活性态史诗与中世纪史诗的研究关联性，尤其是在研究《贝奥武甫》、《罗兰之歌》等以书面形式传承但又具有口头渊源的史诗方面。通向中亚的道路，是我后来在巴拉维国家图书馆搜索书目时得到拉德洛夫的《北方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的典范》（*Proben der Volksliteratur der türkischen Stämme*）丛书的完整版本时开启的。拉德洛夫引人入胜、尽显古风的德语文本，向我展示了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激情，富有浪漫历险，神奇而魔幻的世界，并促使我鬼使神差般地投入其中。它与中世纪叙事之间的平行关联十分显著，而且是值得一番深入探讨的问题。这是一条曲折漫长的道路。我在这条路上，遇见了同行者，那些像我一样的中世纪学家们已经用比较的视野研究了突厥语民族的英雄史诗。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我得以继续营造，一往无前，正像查特斯·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所言，犹如一个矮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尽管最后，我没有写出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比较研究著作，但以一个中世纪学家的视角，在本书中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对于读者还是非常明确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受惠于许多人和研究机构。德国研究基金（DFG）向我提供了若干次长期到中亚，包括苏联和中国开展研究的旅途经费。德国科学交流组织（DAAD）资助了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卡拉卡尔

帕克努库斯的大学里开展研究。我还多次应邀到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对我的研究曾给予热情帮助的本土学者中,我首先想对塔什干乌兹别克科学院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托拉·米尔扎耶夫(Tora Mirzaev),以及曾在努库斯乌兹别克科学院卡拉卡尔帕克分院工作,现在努库斯大学任教的卡比利·马科萨多夫教授(Qabil Maqsetov)表达最真诚的谢意。对于我从事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研究,我所在的波恩大学中亚研究室同行们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我非常感谢瓦尔特·海西西(Walther Heissig)教授请我参与一个“特殊研究课题”(Sonderforschungsbereich)。同时还要感谢,约翰·麦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教授邀请我承担本书的撰写任务,因为本书早已列入“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口头传统研究系列丛书”(Albert Bates Lord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的选目中。

我还想对剑桥大学的约翰·斯蒂文森(John Stevens)教授和伦敦大学的哈托(A. T. Hatto)教授表达我特殊的谢意,他们在阅读本书初稿时在打印稿上留下了许多极有价值 and 启发意义的批注,并且纠正了许多错误以及表述不够准确、不够妥帖之处。当然,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是我本人必须承担的。在剑桥大学求学于其门下时,斯蒂文森教授就鼓励我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去审视英国中世纪文学,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研究所给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哈托教授自从我们1977年在波恩召开的第二届学术研讨会(Epensymposium)相识起就引导和支持我的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研究工作,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使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受益匪浅,而且在更大层面上丰富了我对中亚口头史诗的研究。最后,我还想在这里对不久前去世的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教授表达悼念之情,我曾有幸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期间与他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他的那本《故事的歌手》对我的后期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这本关于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学术著作将会出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丛书之中,对此我感到万分自豪。

卡尔·赖希尔

导 言

要研读荷马的著作，
白天阅读，晚上沉思；
通过你的判断，箴言涌现，
追寻缪斯的灵魂到达源泉。

波普（Pope）：《一篇关于批评的论文》

荷马的诗歌不仅对西方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维吉尔到詹姆斯·乔伊斯以及更多诗人持续不断的研究普遍加深和提高了我们对史诗和英雄歌的鉴赏能力。《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个“浩瀚的……那位沉思的荷马统治的领地（凯特语）”已经成为西方读者烂熟于心的世界，并且能够引导首次接触古希腊之外其他史诗传统的人们。如果关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解读西方以及非西方史诗的话，那么对于当代或近现代口头史诗传统的研究同样能够烛照荷马式史诗的研究。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早在1885年，当威廉·拉德洛夫（Wilhelm Radloff）^① 在他

^① 威·拉德洛夫（Radloff, Friedrich Wilhelm；又 Radlov, Vasily Vasilievich 1837—1918）：德裔俄国民族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他曾于1862年和1869年在中亚吉尔吉斯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记录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文本以及这部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部分章节共计12454行，并于1885年在圣彼得堡把这个文本编入自己的系列丛书《北方诸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典范》第五卷〔《论卡拉—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的方言》（*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中刊布。他在为这个卷本前言中有关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奇演唱史诗的田野调查报告对于玛纳斯奇表演史诗现场的描述、评介，对于玛纳斯奇用现成的“公用段落”创编史诗的讨论以及对柯尔克孜族史诗歌手与荷马的比较研究启发了西方经典的“荷马问题”专家，并对后来影响世界民俗学界的“口头程式理论”（即帕里—洛德理论）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译者

的《北方诸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典范》(*Proben der Volksliteratur der Türkischen Stämme Süd-Sibiriens*)丛书第五卷那篇宏瞻翔实的前言中指出吉尔吉斯(柯尔克孜)^① 史诗与“荷马问题”^② 的关联时就引起了比较文学家的注意。

我坚信,对于所谓“荷马问题”的争论引出如此难以调和的对立观点,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一方理解或真正理解“*aoidós*”(希腊语:歌手)的本质。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歌手就像荷马的歌中所描述的那样,是“*aoidós*”的最佳范例。^③

然而,无论是“分辩派”还是“统一派”都没有采纳拉德洛夫的建议,即通过深入研究吉尔吉斯口头史诗来解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与荷马研究学者维列莫维茨-默伦多夫(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不同,“荷马问题”专家们完全否认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拉德洛夫所搜集的口头史诗进行比较的合理性,对拉德洛夫所搜集资料的认识不仅十分肤浅而且微乎其微。同 M. P. 尼尔森(M. P. Nilsson)^④ 关于史诗起源和传播的讨论一样, E. 德雷鲁普(E. Drerup)^⑤ 在研究口头史诗时

① “吉尔吉斯”与“柯尔克孜”是我国学者对于“Kirghiz 或 Kyrgyz”这一族称的不同音译方式。在我国学术界,通常把居住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其他国家的柯尔克孜人“Kirghiz 或 Kyrgyz”称为“吉尔吉斯”,而把国内的“Kirghiz 或 Kyrgyz”人称为“柯尔克孜族”。实际上,这些称呼都是同一个民族名称的不同音译。为了读者的区分方便,在后文中凡遇到国内族称,我们依然按照目前通用的惯例把国内的“Kirghiz”译为“柯尔克孜”,而把吉尔吉斯斯坦及其他国家的“Kirghiz 或 Kyrgyz”仍然译为“吉尔吉斯”。——译者

② “荷马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者为回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是出自荷马一人之手还是不同时代的歌手共同创造而最终由荷马复合而成问题的争论。争论的两派分为“统一派”和“分辩派”两个阵营。分辩派从观察史诗语言上的和叙述上的不规则入手,将其归纳为是不同的诗人和编辑者的参与所致。于是,荷马的复合文本便被理解为是在长达许多世纪的过程中经过反复创作加工而完成的产物。统一派则认为这两部史诗是由一位天才的作者即荷马独自创作出来的。——译者

③ 拉德洛夫前言的英译文见“Samples of Folk Literature from the North Turkic Tribes. Preface to Volume V: *The Dialect of the Kara-Kirgiz*.” Trans. G. B. Sherman, A. B. Davis. *Oral Tradition*, 5, 73—90. 1990. 汉译文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附录,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62页。——译者

④ M. P. 尼尔森:英国学者,著有 *Homer and Mycenae*, 1933年,伦敦。

⑤ E. 德雷鲁普:德国学者,著有“Homer und die Volksepik,” *Neophilologus*, 5, 257—273. 1920。

也把吉尔吉斯史诗纳入到了自己的视野之内,但二者都没有细致地研究拉德洛夫所搜集和编辑的资料。^①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荷马问题”研究遭遇“瓶颈”,研究者不得不通过对一个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开展调查进行验证的时候,西方学者却已无法对中亚突厥民族的史诗传统开展任何形式的田野作业了。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只好转向前南斯拉夫地区,但他们都意识到了突厥语民族(史诗)资料对研究“荷马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在各自著作中出现的数个吉尔吉斯和突厥民族史诗参考资料中得到验证。^②

尽管拉德洛夫的资料得到了个别西方学者认真的研究,尤其是H. K. 查德维克(H. K. Chadwick)和N. K. 查德维克(N. K. Chadwick)在他们的《文学的发展》(*Growth of Literature*)第三卷(1932—1940年)以及M. 鲍勒(M. Bowra)^③在其关于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1952年),但除此以外,对于西方比较文学家来说,20世纪搜集和编辑的大量资料仍是基本上尚未涉猎的巨大资源。维克多·日尔蒙斯基(Victor Zhirmunskij)曾为诺拉·查德维克关于突厥(鞑靼)史诗概述性著作的再版编写过一个附录,但是他所征引的许多文章和研究著作除了极个别的专家之外,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依然十分陌生。^④除了一些凸显的特例外,这种情况直到韦谢洛夫斯基(A. N. Veselovskij)^⑤的时代才得到稍许改变。

① 见德雷鲁普,1920年;尼尔森,1933年,第184页。

② 见帕里,1971年[1932年],第329、334页;洛德,1960年,第281页;并比较洛德,1987a。

③ 鲍勒: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古典学家,1946—1951年曾任牛津大学教授,之后又出任该校副校长。主要著作有:*The Creative Experiment*,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Heroic Poetry*, *The Greek Experience*, *Primitive song*, *From Virgil to Milton*等。——译者

④ 查德维克,日尔蒙斯基,1969年。用西方语言对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简短论述见鲍勒托弗,1964年;哈托,1965年;巴什阔兹,1978a。

⑤ A. N. 韦谢洛夫斯基(A. N. Veselovskij): 1838—1906年,为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创始人,其代表作《历史诗学》(1870—1906)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和方法论。他对文艺的起源、文学的样式和体裁的形成和演变,情节史、修饰语史,以及诗歌语言风格、对比手法等一系列诗学基本问题的范畴进行了追根溯源,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开拓性的创建,开辟了一条“从诗的历史中阐明诗的本质”,把文学史的研究和诗学理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文艺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道路。他生前只发表了《历史诗学》的部分章节。全书直到1940年出版第一版,由日尔蒙斯基编注并作序。该版本包括了作者生前未发表的大量讲稿、笔记、提纲、学术考察报告等等,篇幅浩大,内容深刻。为了便于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苏联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历史诗学》的新版,汉文版也是据此翻译出版。参见韦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译者

他在 1881 年举行的一系列讲座中,对西方学者由于缺乏现场观摩和体验真正意义上的口头史诗(演说)的经验,从而倾向于把中世纪流传的史诗完全用书面文学的观念进行研究给予了批评:

西方学者,对活形态的史诗知之甚少,他们不自觉地把纯书面文学的问题移接到古代流传的史诗研究当中。这是整个《尼伯龙根》(*Nibelungenlied*)^①以及部分荷马史诗研究的错误所在。

(韦谢洛夫斯基:1940 年,第 622 页)

不过,当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口头史诗产生了兴趣。于是,用西方语言撰写一部关于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方面的专著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但是,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多样性以及纯粹用原文记录文本等因素,使我们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其展开细致而充分的探讨。这一点会在后面的章节中逐渐明朗起来。目前的研究只能算是一个概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大大受惠于突厥学家和比较文学家的著作,所有这些都将在西方学者、俄国学者和本土学者相关的参考书目中得到反映。

今后在对突厥语口头史诗分析和研究中必须遵循尼尔森在自己著作中所指出的:“对现存所有的史诗进行比较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是更好地揭示希腊史诗生成和发展规律的唯一方法。”^②作为一名中世纪文学研究者,笔者在这里想要补充的是,对于那些中世纪史诗而言,必须呈现其“口头背景”(oral background)。荷马史诗以及其他诗歌均萌芽于口头传统的观念,在尼尔森的头脑中是非常明确的。无论如何,它的作用不仅因为其历史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审美因素。欣赏那些尽管只保留其书面形式但却能够被推测为产生于发达口头传统的经典史诗或中世纪史诗,最重要

① 《尼伯龙根》:日耳曼民族最著名的英雄史诗,大约产生于 1198—1204 年之间,作者不详。全诗共有 39 首歌,2379 节,9516 行。取材于因匈奴西进和日耳曼民族内部发展而引发的民族大迁徙后期的某些历史事实,并吸收了其他民间传说和故事。史诗的韵律独具一格,亦称为尼伯龙根诗体,每 4 长行为 1 节,每 1 长行中间用一停顿分为 2 个短行。每节前 3 行中每行有 7 个扬音,第 4 行有 8 个扬音。为了便于朗诵,采用脚韵,每行 1 韵。但由于多次加工改动,有些段落也用了句首韵,因此亦可称混合诗体。目前有 32 种手抄本,其中 10 种较为完整。现在通行的版本大多以霍恩内姆斯发现的抄本为依据。1757 年瑞士作家博德谟第一次予以印刷出版。——译者

② 尼尔森,1933 年,第 138 页。

的是要了解口头语言艺术作品与书面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Beowulf*)^① 看成一位著名诗人因受到维吉尔《埃涅阿斯纪》(*Aeneid*)^② (或者用德国式的结构创作出某种基督教寓言) 激励而利用德国传说创作出的一部史诗, 并将其视为口头诗人的创作, 试图将其演述为像古代歌手讲述《芬恩斯堡》(*Finnsburh*)^③ 时由《贝奥武甫》本身所唤起的口头故事讲述的语境是有显著区别的。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④ 的前言中, C. S. 刘易斯 (C. S. Lewis) 强调了作品的这种艺术层面:

判断一个真正的艺术品与通往教堂的螺旋式楼梯之区别的关键在于要知道它是什么, 即它被用作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 禁欲改革者也许会认定那螺旋式梯子是为某种阴险的目的而修建的, 共产主义者则会认为教堂的修建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但是, 此类问题会在以后提出。首要的事情是要了解你眼前的事物: 当你把螺旋式楼梯设想为开启罐头, 而教堂是为了接待游客时, 你就会对他们

① 《贝奥武甫》: 英国古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叙事诗, 共计 3182 行。据记载, 史诗中的英雄人物生活在公元五六世纪。早在六七世纪, 它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日耳曼民族聚居的北欧沿海, 相当于现在的丹麦、瑞典地区, 也就是当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地。这部史诗大约于 8 世纪形成文字, 10 世纪末一位不知名的僧侣在前人的文字基础上加以整理修改, 最后形成今天这个本子。原稿藏于大英图书馆, 采用的语言是西撒克逊语。1815 年, 史诗第一次刊印出版。史诗结构严谨, 内容集中。它以葬礼开始以葬礼结束, 中间描述贝奥武甫一生当中的两件大事。诗中有大量的插入情节故事, 起到对比或类比或暗示作用。如同古英语其他诗歌一样, 这部史诗不用尾韵, 而是用句首韵, 即每行诗开头的辅音或元音相同或相似。——译者

② 《埃涅阿斯纪》: 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 (公元前 70—前 19) 创作。全诗共分 12 卷, 讲述了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陷落后的流浪生活, 赞颂了奥格斯杜国王统治下的辉煌时代。——译者

③ 古英语诗歌作品中保存着一个残篇 (只有 50 个诗行), 名叫《芬恩斯堡之战》(*The Fight at Finnsburgh*)。故事梗概如下: 半丹麦人 (Half-Danes) 国王赫纳夫 (Hnaef) 把妹妹希德贝 (Hildeburh) 嫁给弗里西安国王芬恩 (Finn)。赫纳夫和他的随从访问芬恩和希德贝于芬恩斯堡, 受到芬恩的款待。在宴会上主人和客人发生争执, 不欢而散。当夜, 赫纳夫和他的随从都在芬恩斯堡大厅中休息。芬恩背信弃义, 率领部下夜袭赫纳夫休息的芬恩斯堡。赫纳夫和部下抵抗了 5 天, 终于战败, 被杀死。对方也损失了太子 (芬恩和希德贝之子), 舅舅杀死了外甥。后来, 赫纳夫的部下亨基斯特 (Hengest) 替赫纳夫报仇, 在芬恩斯堡打败并杀死了芬恩。参见李赋宁《贝奥武甫: 古英语史诗》, 三联书店 1992 年版。——译者

④ 《失乐园》: 由英国古典诗人约翰·弥尔顿 (1608—1674) 于 1667 年创作。全诗长达 1 万余行, 分 12 卷。故事情节主要取自《创世记》和《启示录》。——译者